

海派小品集丛
许道明 冯金牛 选编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章衣萍集：
随笔三种及其他



章衣萍集：
随笔三种及其他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8 号

责任编辑 郭 玲
装帧设计 周建国

章衣萍集:随笔三种及其他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新华路 200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75 字数 113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0,000

ISBN—7—5432—0095—3/I·12

定价:4.00 元

前 言

当下海派文化、海派文学之类，不只被人说得眉飞色舞，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呼唤，文人雅士们不甘寂寞，“扑通扑通”地一个一个“下海”，大有北上西进、全面辐射的怀抱。时代新分子一激发，文学也会随之大转换，势所必然也。

其实，在传统的眼光下，海派再张狂、再妩媚，也难以摆脱“庶出”的命运。自它正儿八经来到这个世界，已近百年却从未享受过如今的荣光。它本出诸清末民初的梨园，与“京派”相对应而存在。两派最初虽有纷争，彼此却并没有特别的过不去。京派大师梅兰芳 1913 年第一回到上海，硕大无朋的海报给他的印象并不坏。在他大名之前冠以“敦聘初次到申独一无二、天下第一青衣”的字样，这在北京更是不曾有过的。不知是受用抑或惶恐，梅博士倒用了心考察了沪上剧目、舞台、灯光的种种，满脸是“很有些愉快和兴奋”的神色，甚至回到北京后，还说“受了海派的熏陶，得了许多实际的好处”。这实在是很令人留恋的气氛。

大概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情形才有了改变。不少在北方住久并住惯了的文化人随政治中心的移至宁沪一带，最终失却了旧京都的依持，纷纷来到南方。本来，南下便南下嘛，麻烦的是他们偏对南人的“学风”、“文风”很不以为然，下车伊始，便生出了不少讽刺挖苦的冲动。鲁迅骨子里

DR-25 / 11

与“京派”的因缘并不浅，他初来乍到上海，对十里洋场文化人的作派也是很有些看法的。讲演《上海文艺之一瞥》便是著例。在老人家是松松爽爽的“一瞥”，落在海派文人身上的却是“才子加流氓”的沉重一击。大约两年后，“京派”重镇沈从文一味的天真，假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将海派文人的丑态大大地编排了一番。说沈从文攀附伟人、谬托知己是很可冤枉的，不过，他曾读过《上海文艺之一瞥》大可不必怀疑，他再三再四地申言，鲁迅等人虽身居海上，却不属海派，也是白纸黑字。小辈们的你来我往，免不了生出许多闲气，鲁迅似乎看不下去，出来讲话了——《“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京派”和“海派”》等三篇杂文已删削了《上海文艺之一瞥》的尖锐，代之以透彻而平实，对京海两派分别从现象到本质作了个性的定位。之后，两个派别依然存在，但似乎少有人再有兴味议论了，而它们在革命和反动较量冲突的巨大身影下也显得影影绰绰。八十年代以降，京味作品与海味作品时有问世，不过已与往昔的“京海”之别并不是一回事了。

鲁迅是说清了这层秘密的。他说：“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

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以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京派”与“海派”》）。目下坊间为海派文学正名的人，无论是硕学还是新秀，大都忘不了这只现成的援手；“近商”、“帮商”，商品经济对海派文学的制约和影响，大抵成为他们立论的发脚点和归宿。

海派散文小品作为海派文学殿堂的一角，亦当如是观。因着传统的养育和由现实刺激而萌蘖的人生需求，散文小品在现代中国文学中是最有光彩的部门。朱自清曾认为它是一个“优先繁荣”的部门，最初的发展“绚烂极了”。海派自然也占有一席，不过较之“京派”，逊色得多了。海派真正摆出大架势，推出大台面的季候还在三十年代中，当在京海闹过别扭之后。大抵对高压政治的共同反感和普遍畏惧，使它们彼此偃旗息鼓，鸣金收兵，并且在几个头面人物的动作下合好交欢。《论语》、《人间世》、《文饭小品》、《宇宙风》之类刊物的作者阵营便是明证。鲁迅终于也有些“糊涂”了，他在《“京派”和“海派”》中说：“今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他所谓的“一路”，最突出地表现在散文小品领域。他的“糊涂”，大概包孕着巨量的轻蔑，因为他对高压政治一如既往地持有直面和抗争的态度。所以，全盛期的海派散文小品实际上是海上文人逃避政治压迫并且还得到京派文人同情和支持的产物。它们不是战斗的阜利通，不是匕首和投枪，大体确为远离现实风涛中心的小摆设。这类审美倾斜当然不伟大，但并不一概是麻木和沉醉，寄沉痛于悠闲的况味也不短少。其中相当数量的篇什宣叙着普遍性的人生感受，不仅是那一时期人们心灵写真的代表，后世的人们也或多或少可以从中得到些启悟。不是英

雄，未必都应鄙薄，普通人的情怀多有可议之处，却自有其特别的体贴和亲切。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对它们的看法固然不乏崇高感，但终有过苛之嫌。执著于唯一的文学尺度，赢得了可能有的锐利和深刻，却牺牲了应该有的富丽和绚烂。

都市生活的快速节奏，实际上是与它背后的某种悠闲无聊相对应存在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固然是上海的特色，囿于写字间里的无聊散淡和亭子间里的狭促清贫，也是不该有的疏忽。海派散文小品对都市风景线的表现有学着法国拉博的模样“坐在头等车上”的，也有躺在兆丰公园的草坪上望着天空出神的；有胡闹的笔调，也有闲适的情致。随着京派小品作家的精神加盟，周作人式谈天说地的悠闲，废名式顾影自怜的风姿，梁遇春式旁征博引的快乐，也点化着海派的散文小品。上海社区文化的开放性，加强了散文小品吸附各类风格的能力，兼容并包，注重实利。它们对异域舶来品的趋鹜自然不用赘言，终究出诸中国人的手笔，那种按时下新名词“集体无意识”的东西也并不少。绅士与名士、市井气与书卷气相杂相陈。一如海派人物，其日常生活享受，可说是最现代化的，可是，长衫马褂，坐了流线型汽车，到红庙或城隍庙叩头烧香拜神求签，也不足为奇。这几乎已是常识。懂得了这层，便懂得了海派散文小品的大半。

上海人在中国是最会花样翻新的一群，说得漂亮些，上海人有独到的创造精神，喜好时髦，敢领风气之先。海派散文小品在表现技巧上对常轨大都取漫然的态度，对流行色和轰动效应却乐此不疲。刻意捕捉那些新奇的感觉、印象，竭力地把现代人的呼吸，现代生活的全景和节奏，缩入短小的篇章中去，大抵是它们共通的特色。以往相当发达的絮语

体,依然保持着它的幅员,那种本出诸和静的抒情似乎更谐和着个人性格的基调,本土的神韵和外来的幽默相渗透,雅驯和俗谚相溶合,显现出活跃的体貌。当然更多的还是来自都市生活的刺激,敏感和细腻地表现瞬间的感触,发挥哲理大义,点透现代社会的世态炎凉和各色人等的众生相,并且大都最没有架子,往往信手拈来而尽得风流。倘若以往的上乘小品多在比才情,那么海派小品则在比感觉;倘若以往的上乘小品多在追求醇朗和圆熟,那么海派小品则赶赴尖新和效应。它们机敏灵活,变化多端,有某种“魔术”味,它们以没有执着的个性而形成自己特殊的个性。一阵风一阵雨,一如街头的女孩子,今儿流行红裙子,明儿黑头发又飘起来,只要是最新的最摩登的,她们大都难以按捺住激动。日新月异为她们心向往之,而海派散文小品在表现技术上也是以日新月异为理想的。

对人的存在与价值的发现,曾使“五四”的散文小品留心于人生世俗的体察和描写。以身边琐事为对象,观照人生真义,领略人生情味,追求生活风趣,几成一时之好。二十年代末,社会矛盾和作家思想的转向改变了散文小品的题材走向,连写过《背影》、《荷塘月色》的朱自清都发出了“这个时代,‘身边琐事’说来到底无谓”(《欧游杂记·序》)的感叹。海派散文小品却继续发展了“身边琐事”的传统,甚至因为有些话不便说不敢说,硬是在题材取向上由社会退向个人,并且还褪去往昔这类题材的理想,加重加浓了对于人生风味的吟诵,加重加浓了散文小品的消遣性品格。它们多无堂皇的用心,供人休憩解颐,避风息凉占去了大半的功能,犹如一丝微笑,一声叹息,一勺冰淇淋,一把五香豆。几乎没

有什么惊人的思想，更谈不上艺术的坚致，然而它们点点滴滴的魅力恰好适应着置身于商品经济漩涡中的市民心态。日日紧张的生存条件和善于精打细算，养成了沪上民众普遍关注努力和积累，对实惠的追求和对自身精力的宝爱往往使他们不太计较品位格调，唯痛快、新奇、有趣是上。这类十字街头的审美趣味大不同于象牙塔的审美趣味，失去了严肃却获得了通俗。正是这种通俗化，连同现代化，使海派散文小品在满足读者消费的同时，也刺激了作家的生产。

总之，同政治保持距离和对商品经济的适应是海派散文小品发达的原因，它与传统中国文学大异其趣，从而也蒙领诟病。当然，同任何事物一样，海派散文小品也确有它的负面，畸形的都市生活以及由它制约的整个社区文化给海派散文小品也带去了相当不健康的东西。历史上有“良性海派”和“恶性海派”之说，海派文艺中的市侩气、西崽相在散文小品领域中也并不少见。不过，因此而将它一笔抹杀，也是一种病态。特别在今天，繁荣社会主义现代化文艺，发展社会主义海派文艺，历史上的海派散文小品，是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的。

章衣萍(1902—1946)，原名鸿熙，安徽绩溪人。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1919年去北京大学听课，1924年经孙伏园介绍与鲁迅相识，并开始交往，参加筹备《语丝》，为该刊重要撰稿人之一。1927年往上海，任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的秘书，并教授国学概论、修辞学等课。抗战爆发后去四川成都，开办书店。他是一个各样货色齐备的作家，本是“京派”中人，又是“京海合流”的先锋派。他穿着由乔其纱做成的马褂长衫，终隐不住那副“海”得可以的体魄。作为《语

丝》中人，他练就了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身手，但同时摆出风流名士的派头写着名噪一时的《情书一束》。他极欣赏清代龚自珍的“可能十万珍珠字，买尽千秋儿女心”，南下上海之后，又有《枕上随笔》、《倚枕日记》见世。以“摸屁股”之类最终“背叛”了“京派”。于是，也引出了鲁迅的打油诗：“世界有文学，少女多丰臀。鸡汤代猪肉，北新遂掩门”（《教授杂咏其三》）。而章衣萍本人也禁不住“暴露”的诱惑，“呜呼”了起来——“我这永远为了女人而抛弃家人的荡子！”当然，将自己的文字耽迷于男女之类未见得是“海派”的专利，不过，故以俗谚为尖新，倒是不少海派文人的喜好。章衣萍是道地的小品作家，他的小说也写得如同散文一般。他的小品文字多收入《樱花集》（北新书局，1928年）、《古庙集》（北新书局，1929年）、《青年集》（光华书局，1931年）、《随笔三种》（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秋风集》（合成书局，1933年），另有《衣萍文存》（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3年）和《衣萍文存二集》（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5年）。

章衣萍很为他的《随笔三种》——《枕上随笔》、《窗下随笔》、《风中随笔》——得意，这是有些道理的。大抵是病中的寂寞，迫使作者更多地咀嚼着世间的寂寞，唯有昔日师友的风采议论才给他带去了慰藉，感觉到人生之可恋。晋人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特别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显然成了他既成的借镜。品藻人物借着清淡的衣饰，对于师友或记其言语，或述其行为，残丛小语却把人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性情、能力鲜明地浮托出来，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多处风趣横生，富有机智与幽默，而语言又清奇柔丽。对作者来说，西方小品是又一重经验，蒙田、培根的“格言体”

不时成为他的衣袖和光环。这也是当时的风气，对哲理的追求和对人生的喟叹，曾耗去过不少新文学家的心血。

《随笔三种》尽管相当杂芜，包含有一定份量的平庸，但它多少还秉持着《语丝》的传统，“任意而谈，无所顾忌”，有一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气息。它的平庸也正体现了后期《语丝》的作风，战斗精神日益稀薄，而代之而起的是对“商品”的膜拜。章衣萍在《枕上随笔》的序文中就公开认同他的作品是“商品”。对文学作品含有的商品属性的发现，是一种进步，将文学作家推向商品拜物教却是一种极大的误解。

《随笔三种》之外的小品文字，也表现出相当的水准，不少篇什是很值得细读的。相对于一般的海派小品，它们没有开阔的气象，但在亲切与坦率等方面则远过之，在用语上也较自然与通俗。周作人、鲁迅、林语堂等人的影响是很容易从中见出的，至于那些迎合上海滩头市民审美的趣味，当然也是客观存在的。

总之，小品之于章衣萍是最当行的文体，他是一个有明显“京派”倾向的“海派”作家。为聊备一格，我们姑且将他归于“海派”一流。

本集的《随笔三种》及其他选文除明显的文字误植予以改正外，一律按初版原貌排印。集名系选编者所拟。

许道明

1993年7月

目次

枕上随笔(节选).....	1
窗下随笔(节选)	27
风中随笔(节选)	54
东城旧侣	65
怀烧饼店中的小朋友	70
月老与爱神	74
关于“无常”	76
悲哀的回忆	79
吊品青	81
小别赠言	83
古庙杂谈	85
春愁	95
不要组织家庭	98
僭越的忧虑.....	100
病中的觉悟.....	101
不行.....	103
浪漫的与写实的.....	105
我的伤痕.....	108
我的读书的经验.....	114
《倚枕日记》抄.....	119

春秋杂感(节选)·····	125
我的自叙传略·····	134

枕上随笔(节选)

壁虎有毒,俗称五毒之一。但,我们的鲁迅先生,却说壁虎无毒。有一天,他对我说:“壁虎确无毒,有毒是人们冤枉它的。”后来,我把这话告诉孙伏园。伏园说:“鲁迅岂但替壁虎辩护而已,他住在绍兴会馆的时候,并且养过壁虎的。据说,将壁虎养在一个小盒里,天天拿东西去喂。”

十年前,胡适之先生的《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寄了一册送给章太炎先生。封面上面写着“太炎先生教之”等字,因为用新式句读符号,所以“太炎”两字的边旁打了一根黑线——人名符号。章先生拿书一看,大生其气,说:“胡适之是什么东西!敢在我的名字旁边打黑线线。”后来,看到下面写着“胡适敬赠”,胡适两字的旁面也打了一根黑线。于是说“罢了!这也算是抵消了!”

某年,某月,某日,在凡尔赛和会(?)中,各国代表轮流

陈说本国政府的意见，于是，中国的代表顾维钧也站起来说中国政府主张怎样。法国代表克里孟梭(Clemenceau)在旁边听了，冷然地说：“中国在哪里？”

一个美国的科学家到德国去访相对论的发明者安斯坦(A. Einstein)。这位科学家与安斯坦从前并没有会面过的。他进了安斯坦的研究室。时安斯坦正服了衬衫匍匐地下，似乎正有所举动。这位美国的科学家以为安斯坦一定是在试验什么相对论的学理。哪知道，安斯坦匍匐了一会，忽然向这位科学家说：“先生，你能帮助我找吗？我的一张钞票丢了！”

冰心女士在北京一个中学演讲。一个学生问冰心女士是什么派的文学。她说：有些近于法国的高蹈派。又一个学生问：女士从美国回来为什么不做文章了？她说：因为生活上没有什么刺激。

冰心女士的早年作品（我说是她现在没有作品），内容只有母亲和小弟弟。她早年的生活是“哑铃式”的。这哑铃的一端是学校，一端是家庭，中间是一条路。

杜里舒夫人到中国才三日，便演讲批评中国女子大学教育。

杜里舒夫人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讲演，一次的代价似乎是三十元或五十元。讲毕，她把得来的钞票放在手中一张一张地数，数毕，然后向翻译的瞿先生说：“你要不要分一半呢？”

“女子是铺盖,男子是牛。”樊先生这样说。停一会,又叹口气说:“我现在要做牛还没得做呢!”

“女子是鱼,男子是钓鱼的。鱼一钓上手,就可以放在刀板上任意的宰割了。”穆先生这样说。

“女人有两种:一种是老虎,一种是蛇。”S 这样说。

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打过吧儿狗,但他也和猪斗过的。有一次,鲁迅说:“在厦门,那里有一种树,叫做相思树,是到处生着的。有一天,我看见一只猪,在啖相思树的叶子。我觉得:相思树的叶子是不该给猪啖的,于是便和猪决斗。恰好这时候,一个同事的教员来了。他笑着问:‘哈哈,你怎么同猪决斗起来了?’我答:‘老兄,这话不便告诉你。’……”

想起柯君,柯君的父亲是一个守财奴,把整箱的银子埋在锅灶下面,柯君却是一个 Marx 的信徒。(他已经不在人间了罢?)几年前,他对我谈主义,我说:“你不用谈主义了,你还是回家把锅灶下掘一掘罢。”

鲁迅先生在上海街上走着,一个挑着担沿门剃头的人,望望鲁迅,说:“你剃头不剃头?”

我们乡间有个疯子,他的嘴里老唱着:“天上无我无日夜,地上无我无收成!”

一位女士,相信曾国藩的饭后千步的格言,于是,每餐后走一千步,一步也不少。这样走了三个月,把胃走得堕下

来了，只得送到医院去。

某监察委员，有人去同他讨论什么事情，他总是这样说：“好的，好的，回头我想想看。”

胡适之先生在西山养病时，曾填《江城子》一词，程仰之抄以示余，词云：

翠微山下乱松鸣。

月凄清，

伴人行。

正是黄昏，

人影不分明。

几度半山回首望：

天那角，

一孤星。

时时高唱破昏暝，

一声声，

有谁听？

我自高歌，

我自遣哀情，

记得那回明月夜：

歌未歇，

有人迎。

余抄此词匿名与陶知行先生观之，并请其猜为何人所作。陶云：“此适之所作也。”余口：“何以知之？”陶云：“我自高歌，我自遣哀情，正是适之本色。”